

漫读周末  
人世间



杨盼盼妈妈(左)和利雪梅(右)因寻亲结识,一直互帮互助

拿到“左肺癌 I V A期”诊断证明书的时候,利雪梅的脑海是一片空白。

今年4月,她刚经历完一场乳腺囊肿手术;5月,她被后背的剧痛反复折磨,气也喘不上来;6月初,广东省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肺癌晚期……几个月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砸”得她有点儿懵。

但她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在医院的病床上,39岁的她给自己列出了一系列待办事项: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报答辛苦操持的母亲、安排好孤独的小女儿……排在待办事项第一位的,是找回7年前走失的儿子刘家柱,“不想留遗憾就这样走,想再听到儿子叫我一声妈妈。”

寻找刘家柱:7年前5岁男孩在河源失踪

刘家柱是2015年中秋节前一天,在河源老家失踪的。

利雪梅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两时多,还在梅州打工的她给河源家里打电话,想问一下孩子有没有中秋月饼吃。但第一个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她心里咯噔一下,又拨了一遍,这回那头传来丈夫焦急的声音:“孩子不见了,大家正在找。”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挂了电话,急匆匆地就坐车往家里走,“赶回河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家里只有老人坐在地上哭,其他人都在帮忙找孩子。”

她后来询问得知,当天下午一时多,5岁的儿子刘家柱和村里其他三个孩子在枫坝加油站路口往黄沙村方向的一个山坡地玩耍。这是她家房屋后的空地,孩子们经常一起玩。四个孩子中,大的两个8岁左右,刘家柱5岁,另一个名叫罗翰瑜的孩子4岁。

“他们玩一会儿之后,觉得口渴,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回家拿水喝,等他们回来时,两个小的就不见了。”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两个较大的孩子将这消息告诉了家长,大家立刻分头在周边寻找,下午三时多报了警。但遗憾的是,当时附近的监控设施尚未启用,加之该

路段车流量巨大,给警方寻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当天,源城公安的公众号发布了《河源市高新区两名幼童走失,求线索!》的寻人启事;过后,利雪梅和丈夫到公安机关采录血录入了DNA数据库,“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多家媒体也帮忙在各大平台发布了孩子的失踪信息。

但七年来,刘家柱一直杳无音讯。

“我们也在找,一直没什么线索。”利雪梅告诉记者,儿子失踪后,她一度精神崩溃,每天只会在家里哭。但因为还要抚养小女儿,她不得不振作起来外出打工,“不能这样下去,要生活,出去找孩子也需要钱。”

这些年,她把微信名字改成“寻找刘家柱”,加入了无数的寻亲群,并默默关注着各种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因为身体不好,她不能像其他寻亲家长般全国奔波,但她努力学会了制作发布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直播寻子;即便是患病住院期间,她也随身带着一张硬质的大幅寻人启事:“求求好心人帮忙留意,7年前有没有人收养5岁左右的男孩,他是单眼皮,左肋下有条血管瘤手术留下的疤痕,会说河源话,也会说普通话。”

母亲患肺癌:不想杨素慧悲剧重演

今年早些时候,31年前在广州走失的徐剑锋经DNA比对,确认了与杨素慧的母子关系。但令人扼腕的是,五年前杨素慧已因肺癌去世。

“杨大姐生病的时候在广州住院,我们几个寻亲家长都去看过了。”利雪梅说,确诊肺癌晚期后,她反复想到寻亲路上曾经的同行者杨素慧,及其生前和亲生儿子在网上擦肩而过的唏嘘,“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杨大姐,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再看到我的儿子。”

她心底隐隐有些许期待,这些年人脸识别、DNA比对等技术越来越完善,寻亲的效率也越来越高,她所在的多个寻亲群里,也时常传来团圆的好消息。她衷心期盼,失踪7年的刘家柱能遇到好心人,送他到公安机关免费采录入库,“他今年12岁,或许心里明白自己要回家,但没有办法回家。”

但连月来状况频出的身体也让她担心,自己或许等不到孩子回来。她告诉记者,对于病情,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如果能找回刘家柱,她最想跟他说:“把这个家照顾好,妈妈在的时候,会尽最大努力和你好好生活,如果妈妈不在了,希望你帮妈妈照顾好妹妹。”

2016年,利雪梅的小女儿被确诊为孤独症,就读特殊学校每个月生活费要2500元。这些年,她把女儿放在老家由外婆照顾,自己在外努力打工攒钱,但去年检查出乳腺囊肿后,她因为治病已经大半年没有工作,“担心女儿每月的生活费,更担心她将来的生活。”

杨盼盼的妈妈和利雪梅在2015年的一次大型寻亲活动中认识,两个寻亲妈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曾一同去探望生病的杨素慧。在杨盼盼



利雪梅和刘家柱的合影

妈妈印象中,利雪梅是一个善良而且勤快的人,“屋里收拾得很整洁,也很节约,除了必要开销,省下来的钱都用来找小孩。”

“宝贝回家”志愿者燕子陪伴和见证了杨素慧的寻子路,如今也在为利雪梅寻子积极奔走。她坦承,寻找刘家柱的有效线索并不多,目前最大的寻亲特征是“左肋下有个激光手术后约1.5厘米长的白色疤痕”,但志愿者们目前依旧尽最大努力扩散寻亲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刘家柱妈妈实现心愿,不让徐剑锋和杨妈妈的悲剧重演。”

往届尖子生谈高考  
经历远比高分珍贵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余卓尔

1977年,中断十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70万名怀揣梦想的考生端坐考场,奋笔疾书。

2022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1193万名考生刚刚结束这场人生大考,踏出考场,热血未凉。

45年来,考生队伍逐渐壮大,一代一代学子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回望来路,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代参加过高考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天之骄子,看看他们如何评判高考带给自己的改变。

壹「高考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

1977年12月,在高考恢复第一年的语文考试上,刘学红稍作腹稿,一气呵成,落笔写出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记叙她在林业队插队落户一年的经历。走出考场,刘学红自觉考得不错,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却收到另一份惊喜:她的高考作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参与阅卷的老师透露,这篇作文得到99分的高分,仅扣一分。

一时之间,刘学红声名鹊起,顺利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在往后人们的不断考证中,她因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捧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女状元”。但刘学红并不认同这个名号,“我们那时各省各自命题,分数有差异,我这哪算得上是状元呢?”刘学红说。

“除了一开始作文被刊登,周围人还会说道几句外,没有多大水花。”刘学红回忆道,“参加高考的人不多,考上的人更少,到大学一看,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

其实,与当年的高考成绩相比,刘学红更愿意感谢国家恢复高考这项举措。

1976年,作为知青初到林业队时,刘学红满腔热情投入劳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感到迷茫:成绩优异在这里并不顶用,文化知识被忽视,一个人的价值仿佛只能体现在“干活的力气”上,长此以往,出路何方?

“也不是没有过继续读书的念

头,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刘学红回忆道,“要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按照这个标准,刘学红至少还要熬三年,才有可能获得初步资格。

1977年10月21日,当广播中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刘学红毫不犹豫报了名:“这相当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大学。”所有人都特别兴奋,“我在的知青点,大家都报了名,只要你想去,没有人拦着你。”

1978年3月,刘学红踏入梦想中的北大校园,正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扫当初迷茫,度过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涯。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扎根新闻业三十余年,直至退休。

“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点也不为过,在高考之前,我的天地就那么四方一片,当时最好的打算,也就是下乡插队两年后,争取招工回城,找个工作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刘学红说,“但高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不用什么推荐,凭借自己上了大学,我的眼界由此开阔,由衷感谢1977年的那场高考!”

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了刘学红当年的高考准考证、北京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物品,它们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常设展览中,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教育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实物见证。

独木桥,孩子读书竞争激烈,一家人围着孩子读书,不像我们那时,放假回家还要做家务,帮家里做事赚取一些生活费,读书大多都靠自己。”

如今看来,当年余斌霞自己摸索的学习方法,与现在许多盛行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比如她会将错题收集起来,制定纠错本,提高复习效率。预测试之前,余斌霞更多在第二三名徘徊,之所以最终能夺得第一,她认为与自己强烈的目标感有关:“我会给每一步定下目标,学校当时是晚上十点熄灯,我就是点蜡烛或者在被子里打手电筒,都要把当天该看的书看完,明天必须做到哪一步,我都必须完成。”

这些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影响至今,“高考这段时间学到的知识,在漫长的人生中可能用不上,但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被培养和锻炼出来了,这是更重要的东西。”余斌霞坦言,“肯定会辛苦,但不要怕坐冷板凳。”

一定程度上,高考的经历塑造了如今的余斌霞,毕业后,她就职于湖南省博物馆。起初,她被分配到大多数人不愿意去的保管部,天天在库房里与文物作伴,难免枯燥,但她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沉淀,直到成为博物馆的一名策展人,用自己的专业为民族民俗及非遗文化的推广作出贡献。

余斌霞感慨道,“高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高考前,我从没踏出过县城,不上大学可能就在小城里做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是因为高考给了我一块敲门砖,让我有了去看世界的可能。”

高考结束后,她也曾害怕惶恐,担心这就是自己一生中的最高点,此后都要走下坡路,“但我后来觉得,高考给了我机会,能够选择想学的专业,来到我现在的位置,我是有能力从机会中找到新的突破口的。”



目前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汪嘉倩 受访者供图

贰「高考留下的东西让我一生受用」

偶尔,余斌霞翻开自己的高中学生手册,仍然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的成绩并非从一开始就十分优异,成绩单上,甚至有几门科目刚及格及格线,但在1987年的高考中,她以湖南平江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录取。

依照当时的制度,正式高考前,余斌霞要通过淘汰率过半的预选考试,才有资格坐在高考考场上,预选考试结束后,她心里忐忑,甚至没有勇气自己去看分数,担心自己不够格。父亲替她看完分数后调侃:“你都考了全县第一,还在担心自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高考时间正在炎炎烈日,彼时余斌霞却因读书过于投入,而不知外界冷热,这份淡定一直延续到放榜时候。听闻她一举夺得当年全县的文科第一,余斌霞家一下子热闹起来,门前放起鞭炮,父亲单位的领导送来祝贺的表彰镜框,家人都很高兴,但余斌霞内心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备考,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准在哪。”上了大学,她也很少提及这件事。

相比起一个分数,高考于她而言,更多意义在于培养了她的逻辑思维 and 自律习惯。

按照余斌霞的说法,中学时,她的成绩起伏不定,最终高二再发力,实现成绩飞跃。“如果把我当时低谷期的成绩放到现在,估计是很难翻身的,一步没走好,基本就没戏了。”余斌霞说,“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

“高考像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突然有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会觉得读书真的有用,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感觉。”汪嘉倩说,2014年,她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与今年的考生一样,汪嘉倩遇上了“史上最难数学考题”,大题基本难得无从下手,出了考场,她就没对成绩抱太高期望,直到结果出来,她还觉得不可思议。

“你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那些书上或者电视科目上的学者,感觉像打通了次元壁,会有一种不踏实感。”汪嘉倩这样描述自己之后的大学生活。

对于汪嘉倩来说,考得好是一种肯定,这种肯定给了她自信的底气,以至于后面不管面对什么极端的情况,她都会暗自借此给自己鼓励:我是有能力去克服困难的。

一开始,汪嘉倩对自己身上好学生的标签还有些介意,这缘于外界对这一标签的刻板印象,比如“书呆子”“功利性读书”“刷题机器”“没有创造力”,她一度反感于此。后来,她学会调节自己:“我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大家对于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只要我自己的发展不会被这个所谓的刻板印象定义就行。”

逐渐接纳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后,汪嘉倩更多感到一种动力,

叁「高考给了我选择的空间」

肺癌晚期母亲:  
想再听儿子叫妈妈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图受访者提供

想再听儿子叫妈妈



五岁时候的刘家柱